



大会

Distr.: General
5 August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法外处决、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根据大会第 [75/189](#)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7/150](#).

** 本报告是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的，以便列入最新资料。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

摘要

为纪念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任务设立四十周年，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该任务的设立及工作方法随后发生的演变。他回溯了在各位任务负责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制定国际标准和准则的过程。报告还从死刑问题是否与绝对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相容的角度分析了死刑问题，并提出了旨在确保保护国际人权文书所保障的生命权的建议。

一. 引言

1. 2022 年是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任务设立四十周年，这是特别程序中最早开始的单一专题任务。¹ 在本报告中，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莫里斯·蒂德博尔-宾兹回顾了该任务工作方法的发展情况，以及为促进和保护生命权并保障免遭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在任务负责人参与下制定的标准和准则的演变情况。报告还从死刑问题是否与绝对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相容的角度分析了死刑问题，并提出了旨在确保保护国际人权文书所保障的生命权的建议。

2. 特别报告员感谢响应其呼吁而提供投入的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本报告转载了收到的这些回复。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本报告涵盖了特别报告员在 2022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开展的主要活动。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开展的活动载于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专题报告。²

A. 通信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单独或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出了 47 份信函，并向新闻界发表 14 次谈话。

B. 会议和其他活动

5. 2022 年 4 月，在智利卡洛斯·伊巴尔博士研究所 2022 学年开学之际，特别报告员举办了法医学与人权硕士班，重点介绍了任务在制定法证标准方面的作用。同一天，他参加了乌拉圭大学组织的另一项活动，介绍了任务在处理羁押过程中死亡问题上开展的工作。

6. 5 月 3 日，特别报告员向美洲公设辩护人协会作了演讲，讨论法证学在调查侵犯人权行为中的作用。

7. 也是在 5 月，特别报告员应种族、平等和人权问题国际研究所的邀请，对哥斯达黎加进行了学术访问。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在和平大学和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外交学院发表了关于任务的演讲。他还与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研究所和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以及司法和国际法中心举行了高级别会议，讨论在区域一级合作促进和执行共同关心的标准，主要是《关于调查可能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

¹ 在该任务 40 年的历史过程中，阿莫斯·瓦科(1982-1992 年)、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1992-1998 年)、阿斯玛·贾汉吉尔(1998-2004 年)、菲利普·奥尔斯顿(2004-2010 年)、克里斯托夫·海恩斯(2010-2016 年)、艾格尼丝·卡拉马德(2016-2021 年)和现任任务负责人履行了任务。

² [A/HRC/50/34](#)。

8. 6月，特别报告员参加了由美洲人权委员会组织的尼加拉瓜人权状况高级别对话，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国际机制和各国的代表出席了对话。

9. 特别报告员在任务设立四十周年之际，参加了6月27日至29日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法医学和法证科学机构网络第十四次年度会议。也是在6月，他还出席了厄瓜多尔国家法医学和法证学事务局组织的第一届国际法医学和法证学大会的开幕式。在这两次活动中，特别报告员都做了关于《明尼苏达规程》的演讲。

三. 设立任务

10. 大会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定期讨论死刑问题。1968年，大会一致通过了第2393(XXIII)号决议，强调围绕死刑的程序保障非常重要。1971年，大会又在第2857(XXVI)号决议第3段中申明，为了充分保障生命权，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限制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数目，以期在所有国家，都有意愿废除死刑。

11.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之外，早期著名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正在考虑如何应对似乎愈演愈烈的政治杀戮趋势。在围绕政治犯和酷刑问题开展了有效宣传运动之后，这些组织感到关切的是，各国政府似乎在避开羁押政治反对派时可能进行的细致审查，而是选择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而令其“消失”和杀害他们。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包括受害人及其家属有效开展的跨国倡议，例如智利的团结共济会和阿根廷的五月广场祖母组织。

12. 到1980年，当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失踪问题时，国际社会也已开始考虑即决处决问题。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有一个关于“失踪和即决处决”的长期议程项目，但在总部设在维也纳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和五年举行一次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框架内，外交界的倾向和民间社会战略都把实质性辩论的焦点放在死刑问题(“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和政治杀害(“法外处决”)上。在1980年举行的第六届大会上，在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到法外处决问题方面首次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国家(奥地利、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大会东道国委内瑞拉)作为提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以74票赞成获得通过。³

13. 该决议没有界定“法外处决”一词，但谴责了“武装部队、执法机构或其他政府机构实施的、或者准军事或政治团体在上述部队或机构的默许或其他支持下实施的杀害和处决政治反对派或犯罪嫌疑人的做法”。⁴

³ 以下7个国家的表决记录是弃权：阿根廷、智利、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乌拉圭。

⁴ A/CONF.87/14/Rev.1，决议5，第1段。

14. 与此同时，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1981 年 8 月和 9 月的会议上开始审议“任意处决或即决处决”问题，并起草了一项决议，呼吁“最紧迫地审议”这一问题。⁵

15. 人权司司长在 1982 年 2 月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开幕词中回顾了一个无论如何必须作为人权议程上最基本和根本事项加以审议的问题，即必须制止蓄意侵犯生命权的行为。他断言，委员会在生命权方面的作用是“保护人身，防止有组织的力量蓄意杀人”。他突出强调大会最近关于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的决议以及小组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关注。⁶ 人权司司长也明确提到民主柬埔寨局势和波尔布特政权在那里进行的杀戮。他还提到在智利、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乌干达以及南部非洲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他还援引了美洲人权委员会最近的年度报告，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基于 1978 年对阿根廷进行的开创性访问，指出“即决处决、非法处决和法外处决”的数量令人震惊，多数情况下由安全部队实施并且完全不受惩罚。

16. 在随后的辩论中，一些国家呼吁采取行动制止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丹麦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其中提到小组委员会的一份决议，其中提请注意出于政治动机的处决有所增加，需要迫切关注，还提到大会各项决议和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人权委员会于 1982 年 3 月 11 日通过了要求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审查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决议。⁷ 适时任命阿莫斯·瓦科为第一任任务负责人。

四. 专题范围

17. 瓦科先生自其第一份报告开始就明确指出，生命权将是任务工作的规范性基准点。⁸ 他强调指出，保护生命权意味着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无理攻击，国家也有义务保护生命不受个人的攻击。⁹ 他介绍了“即决处决”的定义，即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最低限度公平审判保障缺位的情况下施加刑罚，导致任意剥夺生命；“任意处决”被界定为未经司法或法律程序，根据政府命令或在政府共谋或纵容下实施的杀害；“法外处决”被界定为在法律程序之外实施杀戮。¹⁰ 1992 年，即工作组成立 10 年后，人权委员会第 1992/72 号决议将其任务更名为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任务。

⁵ E/CN.4/1512。

⁶ E/CN.4/1982/SR.1，第 8 段。

⁷ 人权委员会第 1982/29 号决议以 33 票对 1 票、8 票弃权获得通过。该决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35 号决议核可。

⁸ E/CN.4/1983/16，第 22-47 段。

⁹ 同上，第 65 段。

¹⁰ 同上，第 66 段。

18. 随后的任务负责人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在其 1993 年的报告中为执行任务制定了一个规范性框架，指出特别报告员应处理国际人权文书¹¹ 所规定的一切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并确定了需要审议的下列问题：死刑问题；在押期间死亡；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导致的死亡；在武装冲突期间侵犯生命权；(不)驱回问题；灭绝种族行为；受害人的权利。¹²

19. 2002 年，下一任任务负责人阿斯玛·贾汉吉尔阐明了任务的范围，涵盖下列情形：(a) 灭绝种族行为；(b) 在武装冲突期间侵犯生命权；(c) 因国家安全部队或者与国家合作或得到国家纵容的私人武装力量实施攻击或杀害而导致的死亡；(d) 因执法人员以违背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的方式使用武力所造成的死亡；(e) 由于酷刑、疏忽或使用武力或者因危及生命的羁押条件而在羁押过程中死亡；(f) 死亡威胁和忧惧迫在眉睫的法外处决；(g) 将人员遣返、驱回或送回其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或地点，以及阻止寻求庇护的人员离开其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h) 由于当局的不作为或未能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死亡；(i) 不履行对侵犯生命权指控进行调查的义务和将责任人绳之以法的义务；(j) 违反为侵犯生命权行为的受害人提供适当赔偿的义务；(k) 与死刑有关的侵犯生命权行为。¹³

20. 贾汉吉尔女士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将性别暴力包括名誉杀人纳入任务范围，另一位任务负责人阿涅丝·卡拉马尔后来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问题。¹⁴ 现任任务负责人计划继续关注这一问题，为此提出一份调查杀害女性行为的报告。

21. 菲利普·奥尔斯顿将任务阐述如下：

“虽然任务名称似乎很复杂，但应简单地理解为涵盖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的杀戮。这可能包括警察实施的非法杀人、在军事或民事羁押过程中死亡、在武装冲突中违反人道法杀害平民，以及当局未能适当调查和起诉的个人杀人模式”。¹⁵

22. 克里斯托夫·海恩斯认为“任务的规范内核”是生命权，同时阐述了他所称的“保护生命”原则，即除非为拯救生命所必需，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剥夺生命。¹⁶

¹¹ E/CN.4/1993/46，第 42 段。

¹² 同上，第 49-68 段。

¹³ E/CN.4/2002/74，第 8 段。任务负责人通常采取行动的情形分类，供以后使用，例如见 E/CN.4/2005/7，第 8 段。

¹⁴ A/HRC/35/23，第 50-78 段。

¹⁵ A/HRC/11/2/Add.5，第 3 段。

¹⁶ A/71/372，第 22 段。

五. 制定规范性衡量标准

23. 在设立任务时，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议定书对生命权的阐述之外，还有少量零星关于保护生命权的规范性指导。当时也有软法，如 1957 年制定(后于 1977 年修订)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大会于 1975 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以及 1979 年制定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该守则或许对任务而言最为立即可用。

24. 任务存续的头十年见证了一些关键支柱的制定，指导任务工作至今。自那时以来，各位任务负责人一直参与该规范性指导的更新。

A. 与死刑有关的保障

25. 瓦科先生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指出，鉴于侵犯生命权的后果不可逆转，国际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保障，以确保不会轻易判处死刑或剥夺一个人的生命。¹⁷ 他详细阐述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区域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保障措施，特别是关于公平审判标准的保障措施。¹⁸ 随后，他在第二次报告中强调指出，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是“最严重的”犯罪，同时也对“其他一系列可能被视为较轻的罪行”适用死刑表示关切。¹⁹

26. 考虑到本报告中关于死刑的一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瓦科先生还着重指出，“在引致死刑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所有方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都适用”。²⁰

27. 在这两份报告中，瓦科先生谈到了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制定这些保障措施时，承认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和瓦科先生已经编写的两份报告²¹ 的重要性。

28. 保障措施制定后，瓦科先生欢迎这些措施有助于详细阐明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概念，指出这些措施可作为标准，用于确定一项处决是否具有即决性或任意性。²²

¹⁷ E/CN.4/1983/16，第 22 段。

¹⁸ 同上，第 22(a)-(i)段。

¹⁹ E/CN.4/1984/29，第 39 段。

²⁰ E/CN.4/1983/16，第 23 段。

²¹ E/1984/16，第 105 段。

²² E/CN.4/1985/17，第 24 段。人权宣传会在其提供的书面材料中详细说明了这些保障措施以及任务负责人随后的几份报告如何发挥了这一宝贵作用。

B.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29. 1990 年 8 月和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最终通过了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历史记录没有明确说明特别报告员在制定该原则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30. 瓦科先生将基本原则作为附件列入其 1991 年报告，并建议各国政府“审查国家法律和规章以及司法当局的做法”，以期确保有效执行作为任务支柱的所有标准，特别是最近的文书。²³ 次年，他在年度报告中列入了“因执法人员使用武力而死亡”一节。²⁴

31. 基本原则的通过也改变了瓦科先生对使用武力问题的处理方式。瓦科先生曾以《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 3 条及其评注为依据，指出执法人员只有在确有必要并为其执行公务所必须的情况下方能使用武力，但在基本原则通过之后，他能够更明确地提到相称性的必要，同时援引基本原则 4、5、9 和 10，指出这些原则“所基于的基本原则是，使用的武力数量应与所要实现的目标相称”。²⁵

C. 调查原则和最佳做法

32. 瓦科先生自上任以来就强调指出，调查问题将是任务负责人工作的核心，并强调需要在这方面制定最低标准。这符合不断发展的人权实践。

33. 1980 年代，法证学在调查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日益重要，非政府组织“五月广场祖母”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开创性工作尤其体现了这一点。²⁶

34. 瓦科先生在其 1986 年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调查可疑死亡的任何标准都应包括进行适当的尸体解剖并规定应公布解剖结果。他还声称，在任何类型的羁押过程中死亡，都应被初步视为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并应立即进行适当调查，以证实或推翻这种推定。²⁷

35. 同一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第 1986/10 号决议，其中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其第十届会议期间审议任意处决问题，“以期拟订有效预防和调查这类做法的原则”。与此同时，人权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工作的基础上，在其第 1987/57 号决议中建议各国际组织“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起草旨在确保主管

²³ E/CN.4/1991/36，第 598(a)段。

²⁴ E/CN.4/1992/30，第 29 段。

²⁵ 将 E/CN.4/1991/36 号文件第 208 段所载的印度来文的摘要与 E/CN.4/1992/30 号文件第 86 段所载的布隆迪来文的摘要进行对比。

²⁶ 见 Luis Fondebrider,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848 (2002); Robert Kirschner and Kari Hanniba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rensic sciences to human rights investigations”, *Medicine and Law*, vol. 13 (1994); 和 Roxana Ferlini, ed., *Forensic Archaeology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2007)。

²⁷ E/CN.4/1986/21，第 209 段。

机构对所有可疑死亡案件进行适当调查的国际标准，包括要求适当进行尸体解剖的规定”。

36. 维也纳的一个进程曾引导着早期围绕任务设立进行的讨论，该进程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向围绕《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决处决事件的原则》的规范问题。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在其 1988 年届会上通过了上述原则，然后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89/65 号决议中通过了这些原则，大会在次年晚些时候也通过了这些原则。

37. 瓦科先生在其之后的报告中庆祝“任务的一个里程碑”，他指出，由于这些原则充分详细地反映了特别报告员的想法和观点，他在审查涉嫌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事件时能够毫无保留地援引这些原则。未能调查可能侵犯生命权的行为本身就等于侵犯生命权，这一表述将被任务经常反复提及。瓦科先生补充说，任何政府的做法如未能达到上述原则提出的标准，可能被视为表明政府负有责任，即使没有发现任何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²⁸

38. 与此同时，一组民间社会组织发起了一个并行进程，由明尼苏达州律师国际人权委员会协调，以期在特别报告员的指导下编写一份手册或规程，以指导原则的落实。

39. 1990 年 5 月，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注意到上述原则获得通过，促请各国有效落实这些原则。最后，在 1991 年 5 月，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前身)出版了《联合国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决处决事件手册》，该手册迅速成为对潜在非法死亡进行法医调查的通用黄金标准，现在称为《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

40. 恩迪亚耶先生称赞《手册》的定稿是“一份对保障生命权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并敦促各国政府将其中所载程序纳入国家立法和实践，也纳入执法人员的培训方案。²⁹

41. 自这些标准通过以来，任务负责人继续定期就调查工作提供指导。例如，2010 年，奥尔斯顿先生发布了一份关于警察监督机构的报告，强调为了在确保问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必须赋予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必要的权力和资源。³⁰

42.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意识到有必要汇总 25 年来手册所载法律标准和良好法证做法的发展，海恩斯先生召集了一个专家进程，以编制《手册》的更新修订版，作为《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由联合国出版。³¹ 这项工作由两个专家起草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由现任任务负责人担任主席)承担，并由一

²⁸ E/CN.4/1990/22，第 463 段。

²⁹ E/CN.4/1993/46，第 66 段。

³⁰ A/HRC/14/24/Add.8。

³¹ 这一进程与人权高专办合作，落实了人权委员会第 1998/36 号、第 2000/32 号、第 2003/33 号和第 2005/26 号决议所载建议。

个广泛的咨询小组进行审查，成员包括前任务负责人恩迪亚耶先生、贾汉吉尔女士和奥尔斯顿先生。³²

43. 现任特别报告员在最近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探讨了经修订的《明尼苏达规程》如何体现在世界各地的法医实践中。现任特别报告员认为，各国按照国际法的要求调查所有可能系非法死亡的能力往往受到阻碍，他促请国际社会加紧努力，改善世界各地的法医死亡调查制度。³³

44. 卡拉马尔女士在 202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³⁴ 中突出提及修订后的《明尼苏达规程》对死者保护和埋葬地调查的影响问题，《关于保护和调查乱葬坑的伯恩茅斯规程》也部分述及这一影响。³⁵ 现任特别报告员计划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从任务角度进一步制定关于保护非法杀人行为受害人的遗体和遗骸的导则。³⁶

45. 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另一个进程是制定《联合国关于执法中使用低致命性武器的人权指南》。发布这一指南是为了应对在集会治安中越来越多使用“低致命性”武器(例如，特别报告员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负责起草的关于集会管理的联合报告中突出提及这一点)，以及回应对其他场景下使用这类武器造成的伤亡负担(包括致命伤害)的更广泛关切。此外，海恩斯先生明确一个事实，即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鼓励执法人员开发和采购低致命性武器，但并没有就此类武器的使用提供明确的规范性指导，他因此建议人权理事会，应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召集一个专家组来编写这样一份文件。在海恩斯先生及其继任者卡拉马尔女士的持续参与下，人权高专办与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合作，召集了一个由执法、武器法、警察培训和人权领域 50 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起草小组，这些专家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举行了磋商会议。

46. 人权高专办编写并最终出版的导则以基本原则等现行标准为基础。该导则明确规定了采购、测试或使用低致命性武器必须采取的必要保障措施，并着重指出必须就使用此类武器进行具体培训；它还描述了与不同种类武器有关的特定风险因素，概述了合法使用的可能情形，并提供明显非法的武器或应用示例。

47. 这些近期的规范发展包含丰富的相对良好的做法，清楚地表明在现行国际标准和许多情形下国家做法的现时水平之间，执行方面的差距有多大。任务负责人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个中心作用是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克服执行中的差

³² 关于《明尼苏达规程》修订进程的全面讨论，见 Christof Heyns and others, “Investigating potentially unlawful death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2016 Minnesota Protocol”,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52, No. 1 (2019)。

³³ [A/HRC/50/34](#)。

³⁴ [A/75/384](#)。

³⁵ Melanie Klinkner and Ellie Smith, *The Bournemouth Protocol on Mass Grave Pro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Bournemouth, United Kingdom, Bournemouth University, 2020)。

³⁶ [A/76/264](#)，第 48-53 段。

距，尽管这一作用往往未得到充分利用。现任特别报告员重申，他随时准备支持和协助各国和其他行为体努力适当应对人权关切，同时加强国家一级的人权保护。

48. 这些事态发展也表明，任务负责人多年来与学术界建立的合作关系，包括最近与莫纳什大学和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建立的合作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价值。

六. 任务的显著实际贡献

A. 克罗地亚

49. 人权委员会针对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严重人权状况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要求恩迪亚耶先生与其他几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于 1992 年底访问该区域的若干国家，即后来所称的马佐维耶茨基委员会。

50. 这些访问是在《明尼苏达规程》定稿后不久进行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支持的小组包括法证调查员和法医专家，其中就有现任的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小组成员能够在调查期间实地检验《明尼苏达规程》。³⁷ 其调查结果后来促成了国际社会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51. 恩迪亚耶先生在他自己的报告中突出强调法外处决在执行“种族清洗”政策时可能扮演的角色，并就该区域其他地方发生这种杀戮的风险提出预警。

B. 卢旺达

52. 恩迪亚耶先生于 1993 年 4 月 8 日至 17 日对卢旺达进行了国别访问。他在报告中就以下事项发出警告：大量平民，包括政治反对派据报遭到杀害；当地媒体在煽动暴力方面的作用；有可能在布隆迪产生蔓延影响。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基本上对恩迪亚耶先生的预警和建议置若罔闻。

C. 斯里兰卡

53. 奥尔斯顿先生于 2005 年访问了斯里兰卡，并报告了冲突双方违反和践踏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情况。³⁸

54. 冲突结束后，显示斯里兰卡军队涉嫌实施法外处决的视频被公开，并由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播出。奥尔斯顿先生就视频资料发出正式信函，但斯里兰卡政

³⁷ Morris Tidball-Binz,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war crime near Vukovar”, *The Lancet*, vol. 341, No. 6 (March 1993)。

³⁸ [E/CN.4/2006/53/Add.5](#)。

府以视频虚假为由加以否认，奥尔斯顿先生随即自行开展调查，³⁹ 确认图像与真实的枪击事件相符。⁴⁰

55. 2010 年 11 月，在海恩斯先生接任后，第四频道又分享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资料，这次显示了参与枪击事件的一些军官的面部。海恩斯先生经过进一步调查后得出结论，所显示的枪击事件构成斯里兰卡军队实施的战争罪。⁴¹

D. 最近对具体事件的特别调查

56. 近年来，任务负责人对非法杀人的具体案件进行了几次引人注目的调查。

57. 2019 年 1 月，卡拉马尔女士在人权和法证专家的协助下，对沙特阿拉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被杀一案进行了人权调查。

58. 调查发现了可信证据，表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沙特阿拉伯高级官员的个人责任，同时指出，在此类案件中寻求正义和追究责任的目的之一是查明在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中，是谁滥用了职权地位或未能履行其职责。人权调查还提出土耳其政府未能提供保护，包括未能开展有效和彻底调查的问题。⁴²

59. 次年，卡拉马尔女士在其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依照相关国际法，包括与使用武装无人机有关的国际法，提及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马尼被杀案。⁴³

E. 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人权机制的互动

60. 除常规活动外，任务负责人还不时应人权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的要求参加特别调查。上文讨论的马佐维耶茨基委员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早期例子，贾汉吉尔女士参加了 1999 年对东帝汶的联合访问团，海恩斯先生被任命参加 2016 年根据人权理事会 S-24/1 号决议开展的布隆迪问题独立调查。

61. 对东帝汶的访问是根据 1999 年 9 月底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历史上第四届特别会议)的一项决议进行的。人权委员会在该次会议上除其他外，提出请一系列任务负责人访问该国的请求。⁴⁴ 根据安排，特别报告员在 11 月初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一同进行一次联合访问。⁴⁵ 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骇人听闻暴力行为的受害人和证人，

³⁹ 关于奥尔斯顿先生和海恩斯先生对斯里兰卡所作调查的一般性讨论，见 Thomas Probert, “The role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special procedures in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life in armed conflicts” in *By All Means Necessary: Protecting Civilians and Preventing Mass Atrocities in Africa*, Dan Kuwali and Frans Viljoen, eds. (Pretoria, Pretoria University Law Press, 2017)。

⁴⁰ 菲利普·奥尔斯顿，“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就‘第四频道录像带’的真实性编写的技术说明”，为人权高专办编写的文件，2010 年 1 月。

⁴¹ [A/HRC/17/28/Add.1](#)，附录。

⁴² [A/HRC/41/36](#)，第 8 段。

⁴³ [A/HRC/44/38](#)，第 64 段。

⁴⁴ 人权委员会第 1999/S-4/1 号决议。

⁴⁵ [A/54/660](#)。

强调指出必须进行有效调查,并强调,如果在未来几个月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建立进一步调查机制,包括可能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⁴⁶

62. 按照人权理事会第 S-24/1 号决议开展的布隆迪问题独立调查同样也是由理事会特别会议授权,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尽可能迅速地组织一个由现有独立专家组成的调查团进行调查,与布隆迪当局接触,并确保各项努力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其他行动相辅相成和协调一致。任命了两名特别报告员(海恩斯先生和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同时一并任命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独立专家们发现了大量严重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证据,⁴⁷ 并就此对该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警告。

63. 特别报告员至少两次就具体国家的人权状况与安全理事会进行了沟通。贾汉吉尔女士于 2002 年 11 月向安理会通报了阿富汗局势,最近,卡拉马尔女士于 2018 年 2 月向安理会通报了伊拉克局势。

64. 任务负责人也有机会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互动,2014 年 5 月,海恩斯先生向《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通报了与致命自动武器有关的问题。

65. 任务负责人还与设在维也纳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了工作关系。如上文所详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在设立任务的进程中以及在拟订一些核心任务文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特别报告员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修订了《明尼苏达规程》,并制定了《联合国关于执法中使用低致命性武器问题的人权指南》。特别报告员还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出版的《全球凶杀问题研究报告》提供了投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也为特别报告员编写的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最新报告提供了宝贵贡献。⁴⁸

66. 在过去十年中,任务负责人努力与区域人权机制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例如,海恩斯先生是亚的斯亚贝巴路线图的起草者之一,该路线图旨在加强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之间的协作和协同作用。⁴⁹ 然后,他特别与非洲委员会的类似机制密切协作,包括在通过关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4 条(生命权)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过程中密切协作,该意见已成为非洲及其他地区一个重要的规范性参考点。

⁴⁶ 同上,第 74 段。

⁴⁷ A/HRC/33/37。

⁴⁸ A/HRC/50/34。

⁴⁹ 见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可查阅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SP/SP_UNHRC_ACHPR_Road_Map.pdf。

67. 特别报告员还寻求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一个协商机构即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沟通，特别是就与死刑有关的问题进行互动。⁵⁰

68. 最近，特别报告员一直在努力与美洲人权法院建立更强有力的技术工作关系，包括促进和执行任务负责人制定的标准，如《明尼苏达规程》。

七. 判处死刑及其影响

69. 2012 年，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胡安·门德斯先生主张，有必要采取一种新办法，因为有证据显示存在一种不断演变的标准，将关于死刑合法性的辩论置于人的尊严和禁止酷刑的基本概念所构成的框架内，即使尚未成为习惯法规范，也正在发展成习惯法规范。⁵¹

70. 10 年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从酷刑角度重新审视了死刑做法。他还强调指出，死刑的影响超出了被判处死刑的个人。因此，他将分析扩展到家庭，因为家庭往往被忽视，是死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的隐形承受者。

71. 在编写本报告时，特别报告员征求了各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⁵² 他感谢作出回应的所有各方。⁵³

A. 死囚牢房的条件和处决方法⁵⁴

1. 等待执行的痛苦

72. 学者们认为，心理上的折磨是死刑的一个固有特征。死刑使死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预见到身体伤害”，而个人“无力防止这种伤害”，这两点都是心理酷刑的基本要素。⁵⁵ 事实上，在某些案件中，个人对处决的预期导致了自残和自杀以及其他健康挑战，包括心脏病和中风。⁵⁶ 虽然等待处决的痛苦本身不可否认，但各国的不同做法给这种痛苦附加了独特面向。在一些国家，死刑犯只在处

⁵⁰ 例如，在政府间委员会 2014 年于雅加达举行的人权对话中进行沟通，产生了进行专题研究的想法。见 A/69/265，第 52 段。

⁵¹ A/67/279，第 74 段。

⁵² 本报告是在死刑与正义项目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法学院合作的 Eleos Justice(慈悲正义)支持下编写的。

⁵³ 共收到 27 份材料。可查阅 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input-imposition-death-penalty-and-its-impact。

⁵⁴ 本报告侧重于死刑判决后的影响。虽然酷刑不在本报告的范围之内，但在个人被判处死刑之前可能会遭受酷刑；收到的许多材料涉及被控犯有死罪的个人的待遇问题，包括无法获得法律代理以及为逼供目的而使用酷刑和虐待。

⁵⁵ John D. Bessler, “Torture and trauma: why the death penalty is wrong and should be strictly prohibited by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Washburn Law Journal*, vol. 58 (2019)。

⁵⁶ 国际减低危害协会提交的材料，(c)段第(三)项。

决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在另一些国家，个人可能多次面临即将实施的处决，因为受害人的家属有权力在任何时候给予赦免或重新开始血金谈判。⁵⁷

2. 死囚牢房的恶劣条件

73. 等待处决的人可能处于非人境况下，死囚牢房的某些条件，如单独监禁，可能构成酷刑，视情况而定。⁵⁸ 例如，禁止酷刑委员会于 1999 年认定，对关押在最高安全级别羁押中心的一些被羁押人实行感官剥夺和几乎完全禁止通信，给被羁押人造成了持续和毫无理由的痛苦，相当于酷刑。⁵⁹ 在收到的为响应提供投入的呼吁而提交的许多材料中，记录了死囚牢房中的个人每天被单独监禁 21 至 23 小时，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极少照明或没有照明，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有限。⁶⁰

74. 过度拥挤是世界各地羁押设施的一个共同问题，往往导致其他问题恶化，影响到包括死囚区内被剥夺自由者的人权。实例包括：每天 22 小时被关押在一个 8×10 英尺的牢房里，最多 10 名囚犯共用一间牢房，其余时间则戴着手铐在监狱里走来走去；牢房内没有厕所，得不到医疗援助，造成传染病的传播；监狱过于拥挤，导致安全措施不力，惩戒设施持续购置尖利武器就是证明。⁶¹ 有一份材料还报告说，死囚牢房内的人在任何时候手脚都戴着镣铐。⁶² 被关押在死囚牢房的人长期处于这种条件之下，构成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75. 对死囚的心理健康影响也令人关切，这些影响往往因缺乏心理保健和服务而加剧。一项关于死囚牢房心理后果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至少有一种精神疾病，这可能是死囚牢房监禁条件造成的。⁶³ 同样，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当多的死囚报告说感到焦虑、抑郁和悲伤；有些人报告有自残行为和自杀未遂。⁶⁴

⁵⁷ CrimeInfo 和 Eleos Justice 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4 节；伊朗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er of Human Rights 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⁵⁸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将单独监禁定义为“将个人每天 22 至 24 小时关在牢房中，进行人身隔离和社会隔离”。长期单独监禁指的是“任何超过 15 天的单独监禁”，因为在这点上，“隔离的一些有害心理影响可能会变得不可逆转”。见 [A/66/268](#)，第 26 段。

⁵⁹ [A/56/44](#)，第 186 段。

⁶⁰ 亚洲反死刑网络(Anti-Death Penalty Asia Network)、死刑正义项目(the Capital Punishment Justice Project)和慈悲正义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1.1 段；国际减低危害协会提交的材料，第(c)段第(一)项；CrimeInfo 和慈悲正义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1 节；“权益”促进人权联盟(“权益”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3 页；和得克萨斯州暴力后项目(Texas after Violence Project)提交的材料，第 2 段。

⁶¹ 国际减低危害协会提交的材料，第(c)段第(二)项；和 Lembaga Bantuan Hukum Masyarakat 提交的材料，第 2 段。

⁶² Rights Practice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⁶³ Project 39A, Deathworthy: A 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 of the Death Penalty (Delhi,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2021).

⁶⁴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Sri Lanka, “Prison study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Sri Lanka” (2020).

3. 死牢现象：待在死囚牢房的时长

76. 人权事务委员会及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其他机构都认识到“死牢现象”，即死囚因囚犯遭受的情绪困扰。视具体情况，包括在死囚牢房中度过的时间长短而定，死牢监禁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⁶⁵ 因为欧洲人权法院 1989 年对 *Soering 诉联合王国案* 的判决，这一概念“进入了人权词汇的主流”。⁶⁶ 法院认为，按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的做法，囚犯在死囚牢房中的平均时间为六至八年，考虑到这一点以及此类羁押制度的极端条件，包括等待执行死刑期间始终存在和日益加剧的痛苦，以及申请人的个人情况，特别是其实施犯罪时的年龄和精神状态，将申请人引渡到美国将使他面临实际风险，其待遇可能超出《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3 条规定的门槛值。

77. 1993 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采取的办法是，在死囚牢房中的时长可以是构成残忍或不人道处罚的唯一因素。*Pratt 和 Morgan 诉牙买加案* 创立了一个推定，即在死囚牢房中度过五年以上的时间符合认定死囚牢房现象的必要标准。其理由是，国家申诉程序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而向国际机构提出申诉大约需要 18 个月。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加上适当的合理延迟，法院得以提出一个五年时间表。⁶⁷ 在这一裁定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辩称，仅延迟执行死刑就足以支持关于死牢现象的认定。⁶⁸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突出强调超过 *Pratt 和 Morgan 诉牙买加案* 中规定的五年期的延迟执行；据报最长期间为平均 22 年。⁶⁹

78. 然而，门德斯先生表示，长期拖延只是造成死牢现象的一个原因。上述办法有可能向各国传递一个信息，即各国应在判处死刑后尽快执行。然而，等待处决之人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征，即那种痛苦和折磨不会因司法体系迅速行动而被克服，此外，快速的司法体系可能带来缺乏适当程序保障以防止处决无辜者的风险。⁷⁰

4. 处决方法

79.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中澄清，以下处决方法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载列的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石刑；注射未经试验的致命药物；毒气

⁶⁵ A/HRC/36/27，第 3 段。

⁶⁶ William A. Schabas, *The Death Penalty as Cruel Treatment and Torture: Capital Punishment Challenged in the World's Court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5.

⁶⁷ 见 A/67/279，第 46 段。

⁶⁸ 例如，Caycie D. Bradford, “Waiting to die, dying to live: an account of the death row phenomenon from a legal viewpoint”,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Law*, vol. 77, No. 84 (2010)。

⁶⁹ 得克萨斯暴力后项目提交的材料，第 1 段；CrimeInfo 和慈悲正义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1 段；“权益”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4 页。

⁷⁰ A/67/279。

室；火刑和活埋；公开处决，以及“其他痛苦和羞辱性的处决方法”。⁷¹ 在区域一级，在某些情况下，下列处决方法被认定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气体窒息，因为被氰化物气体窒息可能需要 10 分钟以上；⁷² 石刑；⁷³ 绞刑；⁷⁴ 行刑队；⁷⁵ 斩首；和注射死刑。

80. 注射死刑导致的处决失败比例最高。⁷⁶ 有报告指出，注射死刑会造成极度疼痛和长时间痛苦，可能相当于酷刑。⁷⁷ 对注射死刑的被处决人进行尸检发现，大多数情况都发现有肺水肿迹象。这表明，被处决之人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就像溺水或窒息一样，毫无疑问经历了恐慌。2018 年，美国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如那些尸检所示，肺水肿达到了最高法院规定的残忍和不寻常惩罚的标准，使得注射死刑等同于“被称为水刑的酷刑手段”。⁷⁸

5. 死刑对家庭的影响

81. 死刑犯的家人往往是死刑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的隐形承受者。虽然本报告重点讨论死囚的家属，但绝非意图削弱对谋杀案受害人家属遭受的类似痛苦，包括悲伤、创伤和经济损失的承认。⁷⁹ 不能把谋杀案受害人家属的待遇和死囚家属的待遇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两个群体给予更多的考虑。

6. 与家人联系

82. 人权理事会在第 30/5 号决议中回顾，秘密处决或事先预警时间很短甚至完全没有预警的处决，加剧了被判处死刑者以及其他受影响之人的痛苦，促请各国确保事先向父母或长辈照料者是死囚的儿童、囚犯本人、死囚的家人及其法律代

⁷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第 44 段。次年，人权理事会在 A/HRC/42/28 号文件第 16 段中重申了这一点。

⁷² *Charles Chitat Ng* 诉加拿大(CCPR/C/49/D/469/1991)，第 16.4 段；和 A/HRC/42/28。

⁷³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abari v. Turkey*, No. 40035/98, paras. 33–42; 和人权委员会第 2003/67 号决议。另见人权委员会第 2004/67 号和第 2005/59 号决议；CCPR/C/SDN/CO/5，第 30 段；CCPR/C/MRT/CO/2，第 25 段。

⁷⁴ High Cour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Republic v. Mbushuu alias Dominic Mnyaroje and Kalai Sangula*, 1994 TZHC 7, 22 June 1994;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lly Rajabu and others v.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No. 007/2015, para. 119; A/HRC/19/61/Add.3，第 109 段。

⁷⁵ A/67/279，第 40 段；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oberto Girón and Pedro Castillo Mendoza v. Guatemala*, No. 76/17, Case 11.686, paras. 111–118。

⁷⁶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Botched executions”, available at <https://deathpenaltyinfo.org/executions/botched-executions>。

⁷⁷ CAT/C/USA/CO/2，第 31 段；CAT/C/USA/CO/3-5，第 25 段；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ussell Bucklew v. United States*, No. 71/18, Case 12.958, para. 78; A/HRC/45/20，第 45 段；A/HRC/42/28，第 15 段。

⁷⁸ National Public Radio, “Gasping for air: autopsies reveal troubling effects of lethal injection”, 21 September 2020。

⁷⁹ Susan F. Sharp, *Hidden Victims: The Effects of the Death Penalty on Families of the Accused*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11。

理人提供有待执行之处决的适当信息，包括日期、时间和地点，以便利家人和法律代理人最后探视被定罪人或与被定罪人通信，并将尸体交还家属埋葬，或提供尸体位置信息，除非这样做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⁸⁰

83. 一些国家已开始认识到必须关注面临死刑之人的家庭。例如，印度最高法院规定了在处决前应遵循的准则，包括将处决日期和时间充分提前通知个人及其家属，使个人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并与家人最后一次见面。⁸¹ 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政府剥夺了家属的探视权；在允许家属探视的情况下，在从审判到执行的期间，探视条件禁止肢体接触；在一些国家，没有制定规则要求在处决前必须通知家人和法律代理人。⁸² 对死刑相关事项保密，让家人无从得知其亲人即将被处决的信息，因此也剥夺了为此做出准备的任何机会。特别报告员了解到，有些情况下，家属没有被告知处决的日期、地点或方式，有时在行刑数天后才通过媒体或其他被羁押人的电话得知处决一事。⁸³

7. 处决后尸体的处理

84. 前任务负责人卡拉马尔女士在其关于必须妥善处理和纪念万人坑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有亲人葬在其中的人来说，万人坑蕴藏着他们最真切的悲伤。⁸⁴ 虽然关于判处死刑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注意被处决人尸体的处理及其对家属的影响。

85. 一般来说，家属会收到被处决人的尸体。然而，在一些国家，家属被剥夺了埋葬死者的机会。在报告的一些案件中，当局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埋葬，就埋葬尸体的方式规定条件，或对家属施加压力阻止其举行葬礼，特别是在被处决人系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分子或少数群体的情况下。⁸⁵

86. 由于未能在亲人被处决后看到尸体，家属表示长期担心亲人可能被强制摘取器官。⁸⁶

8. 威胁、耻辱和经济影响

87.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大多数材料都突出表明，缺乏对死囚家属的支持。⁸⁷ 非但得不到支持，家属详细描述了作为死囚的家庭成员承担的相关耻辱，包括死囚的

⁸⁰ 见 [A/HRC/48/29](#)，第 9 段。

⁸¹ 项目 39A(Project 39A)提交的材料，第 4 段。

⁸² 得克萨斯暴力后项目提交的材料，第 3 段；欧洲沙特人权组织(European Saudi Organization for Human Rights)提交的材料，第 2 段；亚洲反死刑网络、死刑正义项目和慈悲正义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2 段；和台湾废除死刑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15 段。

⁸³ 欧洲沙特人权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5 段。

⁸⁴ [A/75/384](#)，第 3 段。

⁸⁵ 伊朗 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提交的材料，第 5 页；伊朗人权提交的材料，第 7 页；欧洲沙特人权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7 段。

⁸⁶ Rights Practice 提交的材料，第 6 页。

⁸⁷ 台湾废除死刑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13 段；CrimeInfo 和慈悲正义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2 节；欧洲沙特人权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2 段。

子女在求职时面临歧视的事例。⁸⁸ 许多死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被捕、监禁和处决加剧了其家庭的经济困难。事实上，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许多材料都突出表明，对养家者判处死刑会减少家庭收入，从而让家庭陷入经济上的脆弱境地，进一步将家庭推向贫困和负债。⁸⁹

B. 结论意见

88. 保留死刑的政府必须遵守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所规定的严格条件，这将导致“几乎不可能执行死刑而不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⁹⁰ 根据收到的材料和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特别报告员得出了门德斯先生 10 年前得出的同样结论：目前的做法使得死刑等同于酷刑。

89. 仍然未得解答的问题是，死刑本身是否等于酷刑。十年前，门德斯先生指出，在一切情形下禁止死刑的一项习惯规范正在形成，当时有 97 个国家废除了死刑；今天，这一数目已增加到 108 个国家。⁹¹ 稳步废除死刑是无可辩驳的。

90. 随后，秘书长在其关于死刑问题的五年期报告的 2015 年补编中得出结论，认为死刑在二十一世纪没有立足之地，并指出，鉴于国际人权法和判例以及国家实践的演变，判处死刑不符合人权基本原则，特别是人的尊严、生命权和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⁹²

91.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生命权和禁止酷刑这两个框架无疑有助于限制死刑的范围。⁹³ 然而，由于不同条约明确提到死刑是生命权的一种例外，因此，它们也造成了将死刑等同于酷刑的难题。⁹⁴

92. 一方面绝对禁止酷刑，另一方面对死刑的限制又没有达到禁止程度，由此产生的荒谬被威廉·沙巴斯简明表述如下：

⁸⁸ 项目 39A 提交的材料，第 10 页；Ambika Satkunanathan 提交的材料，第 3 节；和台湾废除死刑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12 段。

⁸⁹ Ambika Satkunanathan 提交的材料，第 3 节；Abdorrahman Boroumand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提交的材料，第 2-3 页；项目 39A 提交的材料，第 7-8 页；“权益”联盟提交的材料，第 3 页；Rights Practice 提交的材料，第 4 页。

⁹⁰ [A/HRC/36/27](#)，第 16 段。

⁹¹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ath penalty”, 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what-we-do/death-penalty/。

⁹² [A/HRC/30/18](#)，第 55 段。

⁹³ [A/HRC/36/27](#)；[A/HRC/10/44](#)；和 [A/HRC/19/61/Add.4](#)。

⁹⁴ William Schaba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Comparative Capital Punishment*, Carol S. Steiker and Jordan M. Steiker, eds.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ampton, United Stat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如果你把某人与电极连接，并通过电击来获取供词，这是酷刑，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除非你把电流调大到足以杀死他们，这是可以的。这就是处理死刑问题的悖论。⁹⁵

93. 在条约的理论分析之外，不只是坚持将死刑作为一种合法的刑事处罚形式而保留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少，认为死刑不构成酷刑的想法根本缺乏说服力。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迫切需要解决这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并促请国际社会解决这一矛盾。最后，本报告还阐明了被处决人尸体的处理情况以及死刑对其家人的影响。死囚在非人的条件下生活，然后痛苦地死去。家人在处决后很久仍遭受污名化、经济困难且缺乏社会支持。关于被处决人尸体处理方式的信息意义重大，不仅对加强处决方法的透明度而言很重要，而且对适当纪念被处决人也是如此，而在这方面秘密行事则会进一步对死者家属造成创伤。当我们认识到死刑对家庭的更广泛影响时，家属的痛苦进一步消解死刑的合法性。

八. 结论

94. 这一任务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案例，可用作研究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作为一个独特的声音，同时也作为汇集更广泛技术专门知识的权威，在阐明国际社会的优先问题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任务存续的四十年中，各国际机构制定的规范性指导越来越多，任务负责人在启发和起草其中一些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预防和调查非法杀人的导则以及帮助推广和有效执行这些指导。

95. 在这个关头，可以说对于这项任务而言，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压倒性的规范共识，而且公众普遍致力于在国家立法中执行这些规范。然而，在表面之下，执行中的差距依然存在，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各国、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以期有效地绝对且普遍禁止非法杀人，并履行保护生命权的职责。作为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必须采用适当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充足资源，为独立调查和执行预防措施的工作增强权能。

96.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严酷现实继续每天从世界各地报告给特别报告员，提请其注意。鉴于当前和可能出现的这一系列新挑战、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非法杀人行为以及对其进行调查的复杂性，这一任务在今天仍与当初设立时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十. 建议

97. 特别报告员在回顾四十年任务历史的基础上，谨提出以下建议。

⁹⁵ Monash Faculty of Law and the Capital Punishment Justice Project, “Eleos Justice: in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William Schabas”, 视频, 2021 年 7 月 15 日, 可查阅 www.monash.edu/law/events/archive/conversation-series-with-william-schabas。

A. 对国际组织的建议

98. 考虑到在这项任务之下审议的问题具有重要性以及这些问题往往对和平与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的程度，应提供更多机会，促进特别报告员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互动。

99. 联合国各机构应与任务负责人协作，帮助填补关于调查和防止非法杀人的大量规范性指导与国家实践存在缺点和不足之间的执行中差距。人权高专办和驻地协调员可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实地存在，为此类技术援助寻找机会并支持具体举措。

100. 区域人权机构应考虑更多地利用任务的核心规范性文件，特别是最近制定的文件，如经修订的《明尼苏达规程》或《联合国关于执法中使用低致命性武器的人权指南》。

B. 对会员国的建议

101. 任务负责人随时准备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建设自己的能力，修订或制定规范国家行为体使用武力的国家立法，并建立有效和可靠的调查机制，以帮助确保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和法证最佳做法，有效调查和防止非法杀人。在拟订延长任务期限的决议时，各国应考虑将提供这种援助确立为一种核心工作方法，并提供适当资源以促进这一工作。

102. 各国应更新对已获授权使用武力人员的培训课程，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103. 各国应依照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决处决事件的原则和《明尼苏达规程》，建立独立调查机制，包括法医死亡调查体系，并为之提供充足资源，以监测国家官员使用武力并对可能的非法死亡进行有效调查，任务负责人曾为上述原则和规程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

104. 各国应促进和支持国际合作，分享法医调查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通过南南合作途径这样做。

C. 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议

105. 任务负责人继续依靠与民间社会的积极协作，特别报告员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继续与任务负责人就关切的专题事项和具体案件及国家情况进行宝贵互动。

106. 在可能情况下，民间社会组织应加紧发挥作用，监测任务负责人所提标准和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帮助查明、记录和处理在有效执行这些标准和建议方面的不利。

D. 对学术界的建议

107. 高等教育机构应考虑通过伙伴关系等方式，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或充实关于任务负责人的工作、标准和建议的专门教育方案和研究。

108. 学术机构还应考虑，以了解执行中差距的性质为目的的各种项目潜力如何。任务负责人随时准备与此类举措协作，正如莫纳什大学最近率先开展的全球法医实践审查。

E. 对私营部门的建议

109. 工商业应遵循任务负责人制定的标准，同时确保尊重人权，包括生命权，并应考虑促进能力建设工作，以防止和调查可能属于非法的死亡。

F. 关于死刑的建议

110. 特别报告员促请各国、政府间组织、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促进关于以下问题的多学科研究：死刑在当今是否可被视为本身就与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相兼容的问题；所谓的死牢现象；死刑可能对被判处死刑和等待处决之人的家属的人权产生的总体不利影响。
